



急需专业技术和突出才能的移民及其配偶和子女，该项限额占每年入境移民总量的 50%。1965 年，国会通过《外来移民与国籍法修正案》，取消了 1924 年移民法中所确立的“国别配额制”。该法案每年专门留出 2.9 万个移民名额给全球各国高级人才，并建立了以家庭团聚和引进专业人才为核心的体制。1990 年，美国国会通过《家庭团聚与就业机会移民法》，推出 EB-1 签证(杰出人才移民)和投资移民签证，进一步扩大了技术类移民的应用范围。

相关资料显示，20 世纪初至 80 年代末，美国最杰出的 360 名科学家中，有 65 名是从国外引进的；114 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中，有 40 名是外国引进的；613 名科学院院士中，有 141 名是来自国外引进人才。

当然，为了留住人才，美国不惜动用明面和暗面各种手段。

明处的手段清晰可见。孙麟分析道，一方面，通过立法筛选与引进人才，使其精准地服务于美国的经济与科技需求，逐步建立起一套以技能和学历为导向的人才筛选机制；另一方面，通过常春藤高校、硅谷神话、美国梦构建一套全球精英共同体的文化宣传矩阵，以巨额奖学金、优越的科研条件和丰裕的生活图景吸引全球青年才俊来美深造，继而通过人才筛选和移民制度将其留在美国。

暗处的手段同样不容忽视。孙麟指出，在世界上某个地区遭受经济政治动荡或战乱之时，美国往往通过提供教育、科研与职业发展机会吸引这些地区的人才流入，并将其纳入本国人才体系。美国也通过高薪待遇、移民便利、科研合作等机制持续吸引其他国家的顶尖人才赴美发展，从而增强自身在科技与战略竞争中的优势地位。

这套组合拳的效果显著。从 20 世纪 60 年代芝加哥

大学教授舒尔茨提出“人力资本投资”理论，将人才视为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；到奥巴马时期将科技创新和先进制造业置于振兴经济的战略位置；再到 2014 年白宫推出人才移民程序简单化改革，方便科学、技术、工程和数学专业的优秀留学生获得绿卡——美国对全球人才的争夺从未停歇。

裂痕与深层困境

然而，这道“人才收割机”的刀刃，并非只朝向外外部。作为移民之国，美国始终未能化解移民治理中的深层问题。

孙麟告诉《新民周刊》，同化政策和种族区隔机制曾长期作为美国移民治理的硬方式。建国后，美国政府尤为注重外来移民在语言、文化、政治上对美国国家身份的认同，具有较强的盎格鲁-撒克逊新教文化中心主义色彩。从印第安人迁移政策、“印第安人寄宿学校”，到对非裔的奴隶制度与种族隔离，再到《排华法案》《绅士协定》《1924 年移民法案》——这些治理手段虽可在一定时期内强化国家认同，但长期来看，则累积了阶层与族群间的不平等，造成社会的结构性撕裂。

20 世纪中叶，随着民权运动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，经济实用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逐渐替代了硬方式，成为美国移民治理的软机制。美国根据全球市场需求和自身发展需要，以签证制度按照移民的经济价值对其进行分流筛选——《1986 年移民改革与控制法案》推出 H-2A、H-2B 签证吸纳低端劳动力，《1990 年移民法案》确立 H-1B

为了留住人才，美国不惜动用明面和暗面各种手段。**明处的手段清晰可见。暗处的手段同样不容忽视。**

